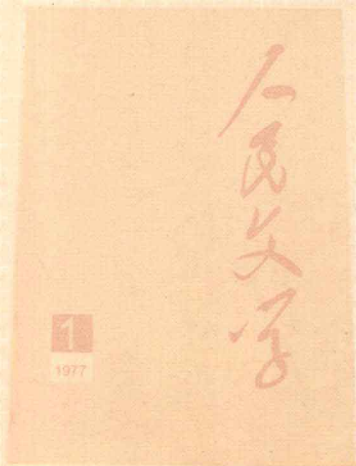


因为《人民文学》在国家与文学之间的拉力与应力关系，因此它的发展乃至曲折，它的停刊乃至复刊，都感应着国家的变动，回响着文学的心音。在国家与文学发生巨大变动时，这种动态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紧张状态，无疑值得特别关注，这正是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所具有的特别底蕴。

新时期 《人民文学》与 “人民文学”

郑纳新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郑纳新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3
ISBN 978-7-5473-0301-6

I. ①新… II. ①郑… III. ①文学—期刊—研究—中国—现代②中国文学—文艺政策—研究 IV. ①I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844 号

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 000 毫米 1/16
字 数:207 千字
印 张:14.75 插页:2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301-6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人民文学》的复刊与“人民文学”的恢复	15
第一节 “人民文学”的建构与《人民文学》	15
第二节 《人民文学》的复刊与文艺政策的调整	36
第三节 《人民文学》的复刊表述与“人民文学”历史的 接续	49
第二章 《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与“人民文学”的 发展	62
第一节 文艺政策的转变与文学空间的开拓	62
第二节 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	71
第三节 改革文学与时代转换书写	93
第四节 乡土、市井文学与当代民间书写	107
第五节 探索文学与文学空间的拓展	122
第三章 《人民文学》的两难与“人民文学”的 淡化	13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33
第二节	寻根文学与视点转移	139
第三节	先锋文学与非大众化	149
第四节	非文学因素对“人民文学”及《人民文学》 的影响	159
第四章	新时期《人民文学》的文学组织活动	172
第一节	文学组织活动与文学自主性的建立	173
第二节	服务于创作的文学批评	192
第三节	张光年与新时期的《人民文学》	206
结 语	223
后 记	229

绪 论

对新时期《人民文学》的研究显然不是出于一种追求事物真相的内在诉求,新时期总的来说是一个开放的时期,并没有多少深厚的掩埋。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出生的我,新时期是人生记忆之初的一段鲜亮痕迹,新时期文学^①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上熠熠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常常使我回忆起往昔阅读新出作品时的美好时光,虽然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样的回忆往往能加深人们对昨天的理解和对今天的观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回忆 20 世纪 80 年代或者新时期,这表明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也还是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的感觉总是相同的。我们这代人有一种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

① 新时期文学,一般指“文革”结束到 1989 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大陆文学。对“新时期”这个概念的起源,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著作解释并不十分准确。这个概念首先来自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1977 年 8 月 12 日作,同年 8 月 23 日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1~6 版),这个报告在“形势和任务”部分开头就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邓小平的闭幕词也使用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概念。此后“新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汇之一,成为各行各业表述时最常用的前缀。把“新时期”与“文学”直接结合在一起并有影响的文献是周扬 1978 年 12 月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后以《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为题在《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23~24 日全文刊出。新时期文学的结束,一般以 1989 年为界限,尽管学界、文艺界有人以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结束,但有一条是相同的,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已经不再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的使命、社会作用、精神风貌和社会地位。按照陈思和先生的共名与无名理论(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1 年版,第 78~79 页),新时期是共名状态,90 年代又进入无名状态,两个时期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

绪,长期接受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教育,长期感受着爱国主义和人民情感的熏陶,长期接受理想的激励,所有的情、信念总是凝结着对国家与民族的关注,凝结着一种对于未来的信念和思索。在大家纷纷清理新时期的精神遗产时,我感到有一种参与表达的 necessity。这与其说我是想回应一些时尚的问题或者参与一种个人的观点,不如说我发现很多精神的事实需要整理,需要重新解读和审察,需要把个人的经验记忆与研究发现整合起来,成为一种可以对当下言说的资料。

于是我选择了新时期,选择了新时期一份非常重要的文学杂志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这里所讨论的新时期遵从一般的理解,即肇端于“文革”的结束,终止于1989年。这个时期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在看来还没有比这个最本初的说法更好的概括。新时期相对于极左时代来说,整个社会发生了全面性的变化。不单是很多不曾有过的高楼大厦耸立了起来,不曾见过的音响电视流行了起来,而且思想观念与文化确乎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从单一的纯粹的乌托邦形态向多元思想文化并存的转变;社会管理与组织的方式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以往那种以政治生活为社会的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强硬的政治措施来控制社会的状态得到了遏制和改变,开始走向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当然,即使在这个时期政治也依然是那么强有力地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至于我们不能说新时期已转变为一个经济时代),实行分层分类管理,权力体系基本上放松了对底层社会的管制;过去那种以强大的乌托邦组织来开展经济生产活动,转变为多元经济形式并行不悖,相对自由却又无序地发展;昔日那种高度整齐划一的社会认同也基本解体,突出的是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多元选择的尊重……如果拿新时期比较于苏联的解冻时期,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终结后的开始,但显然我们的新时期走得更长也更好。这些都是变了,不变的也有,比如在社会习性上,仍然延续着许多“文革”版的燥热和轻浮,热衷于标新立异而很少坚实努力,线性进化思维依然支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思考与规范,那种宏大情怀始终被赋予最高的审美价值,新的社会不公如同那些层层不穷的争议一样继续攀升……总的来说,建设性的不足与理论研究的匮乏,实践中的盲目与热情的泛滥,

使得新时期呈现出鲜明的过渡特征。在这样一个复杂而独特的语境中讨论新时期的《人民文学》，并通过这个杂志来解读新时期文学的主脉“人民文学”，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学，或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想有必要对“人民文学”这个概念予以说明。这些年来，文艺理论与批评界、文学研究领域对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不是非常清楚。在我看来，“人民文学”是中国现代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它经历了从“革命文学”到“大众文学”到“人民文学”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凝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探索与苏俄经验。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提倡，直接的思想资源便是五四新文学与苏俄观念。五四新文学在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两个层面上展开启蒙，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设发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其早期革命家接受苏俄经验，把文学视为组织、教育和动员民众的重要途径，他们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6年张太雷在广州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动员群众，即叫“人民周刊”。1930年初，“左联”成立，汇合了在党文艺家和受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影响的知识分子，共同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及其理论译介传播，蔚成声势，影响全国；“左联”甚至把“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要解决的首要的问题。^①在“左联”诸人的共识中，文学大众化还没有衍生出要把文学变成政治的附庸的思想。左翼文艺运动在理论上的成果主要是文艺服务于民众革命运动需要的思想的确立，在创作上的成果是殷夫、蒋光慈等人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实践。这些成果成为“人民文学”的先声。到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②的发表，建立了具有政治规范性的“人民文学(大众文学)”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关键：一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实际上不仅严格规范了文艺的价值与思想取向，而且影响着文艺的艺术取向。由于战争年代的影响，毛的《讲话》代表了中国民众在民族救亡

① 马良春、张大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0年版，第179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847～879页。

与现代化追求过程中的普遍的现实的选择,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理解和接受。但在解放区通行的主要还是“大众文学”这样的概念,只是这个概念已经与后来“人民文学”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革命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的大众文艺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民文学家,如冼星海、赵树理、周立波等。1948年6月15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创刊,1949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9年5月周扬主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实质上确立了“人民文学”的第一批典范文本。同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和周扬报告均以“人民的文艺”为主词,提出创办《人民文学》,显示了用语方面的高度一致。^①共和国成立,人民主权国家建立,“人民文学”这个名词迅速流行起来。

与“人民文学”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党性”和“人民性”。关于党性,列宁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②虽然这是列宁在阶级对抗社会中对于党性的表述,但我们从这个流传甚广的论断中,还是可以看到列宁对于党性的认识,确定为政党本身最为根本的政治属性,即它的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信念。关于人民性,列宁也有很精辟的论断:“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③这也就是文学的人民立场。在我看来,“人民文学”最本质的属性是文学的人民性,特别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在阶级冲突与斗争已经成为过去的年代,文学的人民性是“人民文学”的精神内核。过去我们在人民性、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等范畴中发生了极大的混乱,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文学的“人民性”被视为取消文

① 郭沫若作的是大会总报告,题目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努力奋斗》;周扬代表解放区所作报告的题目是《新的人民的文艺》。这种用语的高度一致性也正是洪子诚先生所说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特征之表现,见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第63页。

③ 克·蔡特金:《列宁印象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79年版,第11页。

学的党性原则,被视作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概念。这就大大压缩了“人民文学”的精神空间。同时把党在一定阶段的具体政策视作检查党性的标准,这样就导致了党性本身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导致了文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当代文学思潮上的种种波动,反映的是人民文学的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的矛盾冲突,归根结底则来源于这个认识上的混淆。到了新时期,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才获得公开的讨论和认识。^① 党性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是一个政党之为该政党的本质属性,而不是那些在具体阶段处理具体社会问题的政策、方针和措施,虽然它们可能很强烈地体现了党性的要求,但不等于党性本身,特别是在具体的政党领袖或领导团队发生决策错误的时候,就要出现政策与党性的抵牾。因此不应该把具体时间空间中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同于党性。人民性就是人民立场,比党性拥有更为宽广的指向。人民是人的群集,人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体,人民立场是在尊重个体的基础上对人民福祉的关怀与坚守。文学中的人民性应该体现在作者的立场本身与文本指向本身,“人民文学”是一种面对现实具有社会指向的文学,是一种具有公共关怀的文学。

在上述文学观念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人民文学”天然地与现代革命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显示了文学与革命政治的目标合一性。因此,当文学与政治合拍的时候,“人民文学”便显示了无限的生机与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政治也便如虎添翼,迅猛发展,反之则不然。这正是研究“人民文学”的关键所在。

《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载体,与共和国几乎同时诞生,作为中国文协(后改称“作协”)的机关刊,它承担着宣传新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新国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政策,指导新国家的文学创作实践,并传播符合新国家要求的文学——“人民文学”等重要职责。这种在国家与文学之间的桥梁性定位,便也形成了它与国家、与文学之间的拉力与应力关系。因此它的发展乃至曲折,它的停刊乃至复刊,都感应着国家的变动,回响着文学的心音。在国家与文学发生巨大变动时,这种动态

^① 有关这次文艺人民性的讨论情况,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1988年版)下册有较为详细的综述和文章索引。

关系所呈现的紧张状态,无疑值得特别的关注。这正是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所具有的特别底蕴。

现在看来,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研究中,尽管有不少的理论主张纷至沓来,但最具冲击力和生命力的理论观念还是陈思和先生与王晓明先生提出的“重写文学史”。^①“重写”不仅含有对过去的告别和一个新的开端,同时也包含着一个不断否定的指向,因而也是一种面对无限多元可能的指向。从技术层面上看它包含着重新研究和重新书写两个层级的内涵,因而一开始就牵涉着新文学整体中的不同区域、不同面向乃至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特别是在研究不断深化的情境中,在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思潮研究之外发展起来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如在文学传播、文学制度、文学教育等传统文学研究严重忽视的领域的展开,俨然成为新一轮文学史研究的热点和增长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传媒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板块,出现了一大批扎实深入的成果,^②它们在文学作品的精神底蕴、社会思潮的起伏、社会力量的纠结、文学生产与文学体制的关联、各种党派和群体的不同取向与交互作用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很多全新的诠释,使得文学传播显示了充足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价值。与文学界的现代文学传媒研究视角不同的是一些历史、思想史与新闻研究的学者对现代新闻传媒的研究,这批研究聚焦于现代著名知识分子如何利用媒体发起与

① “重写文学史”提出者认为应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以切实的材料补充或者纠正前人的疏漏和错误,二是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载《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第4~5页。)这无疑显示了一代学人重新建立“法度”的要求,是一个极具思想史与学术史价值的倡导,影响极为深远。这些年来不仅是重写文学史,甚至重写各种专门史,都已从理论主张变成学术实践延伸在学术圈内,成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学术研究写作的主潮之一,对当代学术生态的改变发生了重大作用。

② 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与期刊研究首先是由一批资深学者如王晓明、陈思和、李欧梵等在20世纪90年代开拓出来,此后一大批青年学人,不断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开垦这块新领地,如孙晶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研究,刘淑玲对《大公报》的研究,李怡对《甲寅》月刊的研究,孟金蓉对《申报》的研究,柳珊、谢菊、董立敏、高志强对《小说月报》的研究,张涛甫对《晨报副刊》的研究,姜涛对早期新诗出版的研究,张生对《现代》杂志的研究,吉崇敏对《文学季刊》的研究,张志云对《文艺先锋》的研究,等等,形成了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热潮。

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形象塑造中国社会的现代价值体系与观念体系,他们遭遇了哪些不可避免的困境,孕育了哪些重要的思想契机,等等,^①这应该能够启发我们的文学传媒研究,除了文学的视角外,还应该在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受阻中延伸探索的范围。

相比之下,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不仅晚出得多,而且开拓的领域还不广。就目前来看,形成专著出版的都在2000年以后,典型的个案研究与整合性研究还比较少。较早涉及当代文学传媒的是北大洪子诚教授,1999年他在课堂上专门讲述过“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出版和文学报刊作了简要的介绍,^②可以拓荒视之。2003年至2005年有三本研究20世纪90年代传媒的专著陆续出版: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③、陈霖的《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④和黄发有的《媒体制造》^⑤。这三部作品考察的重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进程中文学传媒与文学的互动以及文学的转型。邵燕君借用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观察视角;黄发有从文学期刊、文

-
- ① 如杨琥对《新青年》的研究(《〈新青年〉“通讯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潘光哲对《努力周报》的研究(《胡适与〈努力周报〉的创办》),章清、张太原、陈谦平对《独立评论》的研究(章清《〈独立评论〉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张太原《“强有力的中心舆论”——〈独立评论〉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郑大华、禹江对《益世报》的研究(《〈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高瑞泉对《观察》的研究(《〈观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黄旦对延安《解放日报》的研究(《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林淇滨对《自由中国》的研究(《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党国机器的合与分》),等等。上述论文收入李金铨教授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8年版。此外,傅国涌的专著《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6年版)、谢泳的专著《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现代知识分子与传媒的专著。
- ②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205~209页。
- ③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3年版。
- ④ 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合肥)2004年版。
- ⑤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济南)2005年版。

学出版、跨媒体传播三方面透视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遭遇的问题与发生的变化,展开的文学与传播研究视域相当开阔。孙晓忠和蔡兴水的博士论文对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两个重要文学媒体《文艺报》和《收获》分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孙晓忠对建国初期《文艺报》的研究^①则注重历史的钩沉与总结,分析当代文学报刊体制的创建过程及其对文学生产体制建构的具体作用,特别是《文艺报》在其中所承担的任务、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均有深入的探析;蔡兴水对《收获》的研究^②材料的搜罗较为丰赡,展开的历史跨度为最大。燕华对新时期《小说选刊》的研究,较好地通过一个重要文学选刊来审视分析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变化关系。^③此外,程光炜的单篇论文《〈文艺报〉“编者按”简论》^④、年轻学人陈伟军的单篇论文《被放逐的边缘话语——解读建国初期文坛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⑤以局部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当代文学传媒,值得注意。

对《人民文学》的研究却一直较为匮乏。《人民文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期刊,不仅由于它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被国家权力赋予了许多特殊性、权威性,也不仅是由于在这个刊物上活动着当代中国的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文艺理论家、文学编辑家,更主要的是这个刊物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命运、文艺政策、文艺思潮和文学传播的密切关联。研究这个刊物可以发现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如何具体地渗透和掌握着文学期刊,而且可以观察到一大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文学编辑家的活动和在这些活动中个人的立场、观念、情感乃至个性和欲求的具体呈现,从而演变为当代文学的各种特殊性与普遍性,还可以看到

① 孙晓忠:《建国初期文学报刊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以〈文艺报〉为中心》,北京大学 2003 年博士论文。

② 蔡兴水:《1957 至 2001 年〈收获〉研究》,复旦大学 2001 年博士论文。

③ 燕华:《洪波与潜流——1981 至 1989 年〈小说选刊〉研究》,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第 80~86 页;燕华:《嬗变与重构——〈小说选刊〉研究兼论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流变》,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73~76 页。

④ 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5 期,第 19~26 页。

⑤ 陈伟军:《被放逐的边缘话语——解读建国初期文坛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 44 期)2005 年 11 月 30 日。

国家文艺政策、出版政策如何调整,文学管理如何变化乃至政治权力如何消长。这正是我选择这个具体的刊物作为研究对象的直接原因。对这个刊物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值得注意的工作首当是李红强 2004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人民文学〉十七年(1949~1966)》,^①该作是第一篇以十七年期间(指 1949~1966 这一时期,本文沿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这一通行概念,以下同)《人民文学》为对象的成果,对建国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诸多关键层面予以了深入的论述。其次是吴俊先生对《人民文学》复刊的论述^②,吴俊先生的研究不仅结合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调查了不少当事人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对《人民文学》的创办和复刊过程细密地进行了讨论,对各种因素的消长予以了排比分析,扎实可靠,可以作为定论。王本朝在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中对《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期间状态也有所评述。^③但这三个研究都没有延伸到新时期,留下了空地。

这个空地显然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它提供了我们去探索、去认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全景性的视角,新时期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各种文学实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影,新时期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互动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线索。因此我们通过对这份刊物的研究,应该可以揭开诸多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的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显然是一个包蕴非常丰富的课题,需要有更为全面的观察、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and 多学科多领域的比较与综合,才能整合出一段社会文学思潮的衍变过程。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人民文学》杂志本身的传统和历史定位,二者正是它与一般文学期刊不同的地方。历史的来看,十七年《人民文学》的追寻始终自觉地依附着社会的需要,在绝大多数时候这种社会的需

① 李红强博士论文的修改本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人民文学〉十七年(1949~1966)》,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9年出版。

② 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第34~40页。该文后来收入吴俊与郭战涛合著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7年版),这部著作研究的下限截至《人民文学》复刊为止。

③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第119~136页。

要完全为政党的政策需要所代替,从而体现了非常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被一些学者断定为“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特点,显然无法获得多元化思想背景下的文化认同。我们在观察它努力推动的“人民文学”范型时,可以发现它经历了一个非常艰涩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人民文学”创建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不同理念与思想的分歧与相互激荡。

十七年“人民文学”的追求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失误,也结出了很多畸形的果子(包括理论的与创作的),但也有不少新鲜的创获,从而丰富了“人民文学”的精神空间。它在50年代短暂的春天中所绽放的几朵鲜花,却成了十七年“人民文学”最为光荣的纪录,有力地纠补了严格规范的“人民文学”的偏颇和不足,从而大大地开阔了“人民文学”的内涵。这些特别的旅迹展示了一种必要性,就是我们在分析《人民文学》这个杂志的时候,应该如何围绕它的中心使命——尽管这个中心使命在不同的语境中予以了不同的解释——发展与传播“人民文学”来观察它的努力。

于此,我们发现十七年“人民文学”作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学范型,尽管扭扭曲曲,但在价值层面还是没有脱离它的核心“人民”,正是这一强大的凝聚力,使它在日趋变幻的政治需要中显得手足无措,无法腾挪,终被极左路线弃如敝屣,《人民文学》也就被迫停刊。也正是这一强大的凝聚力使得新时期文学首先致力于恢复这个传统,以这个传统来号召文坛,以创作实践来发展这个传统。这应该说有基础也顺乎时代潮流的。新时期的两个主要作家群体归来者与年轻一代都是长期熏染在集体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长期的思想与伦理教育和民族本位的士人传统^①使得他们天然地怀揣人民,以此作为文学写作的基调。新时期的社会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的红线,那便是对于民族现代化的追求,对于人民幸福的追

① 关于现当代知识分子中的士人传统,余英时先生有其特别的看法,他认为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到40年代士大夫的观念已彻底死亡。(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三民书局(台北)1992年版,第33~38页。)士大夫的观念是消失了,但士大夫的精神并没有随之死亡,相反,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虽九死一生,犹未丧失民本关怀与用世的热情,特别是新时期高考制度的恢复,严格的国家考选实际上大大强化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新时期最为活跃的正是各类知识分子。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文精神的寻思者、新左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以清流自任的重建儒家想象的国学派人物,都依然散发着士人传统的热力和光辉。

求,在这种时代大潮下,精神界的活动无不受其辐射感染,文学创作的人民关怀始终是主流的共识,因此可以说新时期初中期文学的主流还是“人民文学”。

随着社会与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主体性思潮的发起,多元思想的激荡,对社会人生的不同理解和选择也得到了尊重容纳,文学的写作本身由于作家的探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作家主体的心志也产生了很大的裂变,创作遂在多元格局中分流,作为主流的“人民文学”声势消减,特别是文学边缘化时代的来临,更使得“人民文学”渐趋淡化,成为一种多元并立的文学生态中的一元。

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人民文学”这个曾经垄断了整个共和国文学界的主流话语却似乎黯然无声,以至于前几年不少学人出来呼吁“人民文学重新出发”。^①在这场关于“人民文学”的招魂式的努力中,一种值得同情与敬重的民本文学观念(显然无须作民粹主义的怀疑)在呼吸,特别是一些理论工作者重新论述“人民文学”的渊源与理论体系,^②仿佛这些东西不曾驻留需要重新建设。这些历史存在被现在的学术研究工作重新追怀和重新书写,多少还是说明了这种文学范型已经渐去渐远。那么这种文学范型在新时期的具体状态是怎样的?它在哪些层面上获得了丰富与拓展?它为何会淡化,又如何淡化?有多少是文学内部的原因,又有多少是文学外部的影响?它的主要载体《人民文学》与它有着何种深刻的沟通?又如何显示它的阴晴圆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没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的理论意义显然是富有现实性的,它至少能够激发起我们对于社会转型得失变幻的特别关怀。

在世界传媒史上绝大多数的报刊是没有黄金时代的,特别是在十

① 欧阳友权:《人民文学重新出发》,载《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② 冯宪光:《毛泽东与人民文学》,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第4~13页;冯宪光:《人民文学论》,载《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第3~8页;冯宪光:《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0~12页;方维保:《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对王晓华先生批评的回复》,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第79~82页;李国春:《“人民文学”发展的自觉》,载《文艺报》2004年2月7日;张丽军:《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兼与王晓华先生商榷》,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第55~59页。

七年期间中国绝大多数文学期刊的平庸甚至超过了作品、作家的平庸，只有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在严格政治管束时代结束之后，人们精神束缚的解除带来了文学的春天，不少文学期刊因缘际会，鲜花常开，与《人民文学》共同点缀着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百花园。春天的结束自然要引起我们无数的联想，然而我们更愿意理性地审度这个结束如何发生，就像我们密切地关注那个开端又是如何开始。新时期的我们，包括《人民文学》，有多少不足、多少周折引起了这样的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中有多少可以平常心待之甚至为之颌首？但又有多少要让人感慨歔歔？这样，《人民文学》的编刊思想、刊物定位、环境变化、制度调整、社会意识的嬗变、国家文化消费的转变、市场竞争等等层面不能不予以周到的考量。

2006年，《新京报》上发表了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三十多年，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和常务副主编的周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认为新时期是《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① 作为过来人，周明先生讲述的不是纯粹带有个人感情成分的看法，而是一个共同的认识，是有着大量的优秀文本作为支撑的，它不惮于时间与角色的校验。^② 这个事情提醒着我们文学期刊的研究，同时也是文学的研究，期刊发表的作品就是期刊自己的言说方式乃至言说立场，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作者的看法就是期刊的态度，但从期刊发表文章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期刊的认同和采取的立场和策略，我们同样应该对期刊发表的各种文本深入地展开研究，从细读中发现那些精微的事实，以此作为期刊研究的核心之一。我们不能把期刊研究萎缩为纯粹的组织活动或者交往研究。

新时期是历史的一个转折口，国家社会的变革在文学创作、文学政策、文学传播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在这里《人民文学》既是一个承受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策划者，这种既推动又受动的特殊性来自它本身的定位和它的编辑主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新时期国家文

① 周明：《周明：新时期前后的〈人民文学〉》，载《新京报》2006年6月29日。

② 崔道怡：《合订本作证》，载《人民文学》1989年第10期，第6~20页。该文回顾《人民文学》40年历程，历数作品最多的还是新时期。

艺政策领域与文艺管理体制的变化中来考察《人民文学》在当代文艺思潮中的角色意识,追问它为何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和怎样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既要看取其体制内的特殊境遇,包括其历史性的沿袭与现实性的拓展与挫折,又要发现它的突破和建设,在这样往返的视度中可以衡量多种社会力量、意识、传统与文化的相逢和碰撞。

在这一切历史研究中,关注一下那些在关键地方、关键时刻作出了关键性贡献的人物或机构是非常必要的。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特别是那种作为民族脊梁的人物总是不惮于前驱,以一己坚毅的努力运动着社会与时代,是他们的存在历史才显现其规律性的延伸,才有可能让一帮哲学家发现这样那样的形而上的理与道。这样,有必要对新时期《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活动和人物作一番讨论,这将可能直接丰富文本研究之外的考察。有意思的是新时期《人民文学》的四个主编——张光年、李季、王蒙和刘心武,都是有着良好业绩的文艺家,都是“人民文学”的主力创作家,在现当代文坛上有着各自的位置,本文不把他们个人的文学创作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讨论他们的文学编辑工作和文学组织工作,考察他们的作为、主张、胆识和思想意识,他们为此与各方面发生的沟通乃至冲突,以及这些沟通、冲突所包含的思想史、社会史、精神史的内涵,以此来揭示当代体制内领导型知识分子的思维路向与人生特色。在这四位杰出人物的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个核心,那便是张光年。由于张光年在新时期文学界和政治上的特出地位,他对《人民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具体的,因此对张光年的研究,将能够充分地展开对新时期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文学出版和文艺政策的关联研究。

比较《人民文学》与其他文学期刊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猜想。但当我们深入到新时期文学期刊乃至 20 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的整体格局中,却发现这里并不存在着多少可比性。首先《人民文学》不是一个同仁杂志,与《新青年》、《新月》、《创造》、《七月》等等没有多少内在的比照,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文学刊物,承担着国家使命。其次新时期的《人民文学》也不是一个大众文学消费期刊,像《小说月报》、《故事会》、《今古传奇》等,它的本意不在于商业的成功,虽然它也曾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发行纪录,虽然它后来同样需要考虑商业的元素,但在整个新时期